

Lib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自由主义与 美国外交政策

任晓 沈丁立 主编

Ren Xiao and Shen Dingli Editors



上海三联书店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任晓 沈丁立 / 主编

美国外交政策

自由主义与

Liberalism and U.S. Foreign Policy

Ren Xiao and Shen Dingli / Editors



上海三联书店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任晓,沈丁立主编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8

ISBN 7-5426-2139-4

I. 自… II. ①任…②沈… III. 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3570 号



出品/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倪为国、邱红

装帧设计/人之初工作室

美术编辑/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

任晓 沈丁立 主编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200031)

<http://www.sanlian.com>

发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印刷/上海译文印刷厂

版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

开本/890 × 1240 1/32

字数/180 千字

印张/11

书号/ISBN 7-5426-2139-4/D·91

定价/25.00 元

序

时殷弘

《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是于2004年8月举行的一次同名讨论会的结晶,其主办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两个跻身于我国最著名的国际事务研究基地之列的研究机构。后者由复旦大学的七个地区国别研究中心构成,包括就我国高等院校范围内而言从事美国研究的最强群体——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其人才之盛和成果之丰,在专业同行中间近乎有口皆碑。至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就一般的印象而言,其尤为特出之处是对国际关系现状从事大规模、多分支和多层面的探究工作,并且由此产出了众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成果,无论就政府对外政策咨询还是就国际问题专业见识和舆论塑造来说都是如此,何况还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一样,有在世界政治研究领域的中外交流乃至国内有关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的可贵贡献。然

而事实上,与国际事务现状研究有别的理论性探讨也是该所的一大强项所在,虽然因其本性所然,它相对而言必定较少引人注目,所造就的思想和实践效益也不像现状研究一般能够产生得那么直接。

尽管如此,理论性探究仍然有其不容轻视、更不容忽视的重大意义,有其宝贵的(如对于理论的本性和潜能作过最深切的辩证思考的克劳塞维茨所言)实用功能、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它只要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对于现实的长时间研习,而不是被当作教条或被设想为某种现成的行动手册,就能大有助于“准确地分辨乍看来混为一团的事物”,成为“人的一个指南,照亮他的学习道路,便利他的进步,训练他的判断能力,并且帮助他免入陷阱歧途”。^① 这样的理论性探究或其结果——基于并符合理性常识的理论^②——无论其抽象程度如何,都在本质上与现实和实践密切结合,并且特别容易出自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学理思维与实地考察的自觉和直接的交织及其相辅相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的理论性探究大致总是以这样的交织为特征,或者借用其副所长、美国问题著名研究者杨洁勉研究员在“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讨论会开幕词中强调的话说,显示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国际关系现状研究彼此结合的裨益和重要性。

《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文集汇总了来自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一些学者撰写的一组论文。有如任何有其鲜明和“紧凑”的主题的文集,《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显而易见的

①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 J. . 1976, p. 101.

② Pater Paret, “The Genesis of *On War*”, in *ibid.* , p. 12.

“灵魂”或根本纲要,便是由主办单位提出的“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主题。这是一个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皆为重大的主题,有予以集中讨论的需要,尤其因为近年来新保守主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权势政治国际关系理念和单边主义/黠武主义对外政策信条风行美国翻腾世界,导致国内外有关研究界的关注目光和探究努力压倒性地偏重于一端而多少过度“冷落”了另一端,以至(至少从现实性的角度说)业已明显地落后于美国政治和对外政策舆论方面的某些变迁趋向,这些趋向确实已经出现和正在发展,即使假定它们不会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招致基本变更。

自由主义作为理论—历史概念和哲理,作为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乃至政策行为信条,包含非常丰富的内涵,具有非常可变和多样的实在形态,以至它始终跻身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头等难题之列。然而,只要对这一历史有最粗浅的印象,就无疑会同意它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基本传统之一,正如只要在最起码的程度上知道美国历史的笼统脉流,就必定会将它当作美国政治思想的基本传统之一。同理,不需要有多少关于美国对外关系史的精深知识和专业研习经历,也能毫不困难地确认它是美国或美国式国际关系理念和对外政策思想的根本基础和主要表现之一。这些近乎不说自明的情况,最为显而易见地表明了“自由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主题的头等重要性质。可是,难题毕竟是难题,而且或许可以说越容易使人笼统地感觉到其重要性的大问题,对其真正深刻和广泛的认识或透视就越是困难。不仅如此,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或者较狭隘领域内的两个术语“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这两端相比,自由主义具有中间性质,为一系列带有二元论色彩的观念保留了容身余地,并且因此与上述两端之间存在着彼此渗透的较宽

广的中间地带,这就更增添了辨识、理解、阐释和论说的难度。^①这一点,连同自由主义的历史悠久性、形态多样性以及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之间关系一般必有的高度复杂性,是我们在阅读和评价本文集内的各篇论文时应当时时记住的,并且构成其作者们的探究工作应当格外地得到赞赏的一大理由。

犹如哲学作为总体就是哲学史,自由主义作为总体就是自由主义史。然而,历史既有其连贯性,也有其间断性。连贯性近乎历史主义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②惯用的普遍性或共性概念,它使人可以将历史个体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当作历史过程中承前启后的环节来谈论,并且将这些互相间有历史线形联系的个体“串连”起来,从而辨识出一种特定的历史脉流,连同此等个体在其中的内在涵义;间断性则近乎兰克惯用的特殊性或个性概念,它相对而言是更本质性的,使得历史足够生动、曲折、多变和难以把握,阻绝了任何较宏观的理论模式取得任何超过笼统近似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也只能在笼统近似的意义上谈论自由主义史(在此限于经典自由主义史),其中多有使之难以足够连贯和贴切的间断性。

自由主义作为一类关于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理念,最早大概可见于古希腊民主城邦雅典的政治领袖伯里克

① 参见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New York, 1992. 亦有如讨论会上的指定评论者之一、近年在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研究方面屡有建树的石斌博士所言,其中间性质既是自由主义的长处,也是其短处,因为它兼顾太多,容易模糊,“实践适切性有限”。

② 关于兰克的普遍性或共性概念对其特殊性或个性概念,参见“The Great Powers”, in 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1973, pp. 65—101; Friederich 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London, 1957, Chapter 15.

利。用现代最权威的伯里克利研究者之一唐纳德·卡根的话说,伯里克利“见到了创造世界(到那时为止)所曾知道的最伟大的政治共同体的机会,一个将满足人的最强烈、最内在激情——荣耀和不朽——的政治共同体。这些激情的满足通常意味着人的极不平等;然而,伯里克利相信它们能够由一个基于法律和政治平等的民主制的公民来实现。与此同时,他打算创造一种前所未知的生活素质,那将使人们能够追求自己的私利,但也能够使之谋求更高的目标,办法是使他们的私利为一个促进和倚赖理性、以此造就自身伟大的城邦服务”。^①无疑,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社会理念植根于一种更广泛更笼统的哲理观念,是与对人类世界的现实主义理解大不相同的“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理解,即相信世界的状况可以按照理想来改变的、进步的历史观。

宽泛地说,“自由主义”(理性主义)哲学的历史可溯源于中世纪晚期的大神学家阿奎那。他将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视为有机结合的两个方面,提出理性与信仰互相补充的神学理论。此后,现代早期理性主义哲学认为理性是最可靠的,是知识的源泉。笛卡尔认为知识由先验的理性——“先天观念”、“根本的意识真理”——演绎而来。洛克虽然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知识来自观察和经验,但他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与他基于先验自然理性的社会政治理论自相矛盾。经过边沁和詹姆斯·穆勒,这一矛盾被调和起来,个人的感知和自我利益成了认识和行动的综合依据。^②

① Donald Kagan, *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1991, pp. 136—137.

② George H.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4th edition, Chicago, 1973, pp. 487—498.

在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那里,最根本的概念一直是权势,而在几乎同样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那里,这样的概念无疑是理性。理性作为社会政治概念,构成了前后相继历经千余年的自然法观念、洛克自由主义学说和边沁功利主义的核心。自然法观念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亚派,经过中世纪的种种变迁,到17世纪初由格老秀斯发扬,成为现代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洛克在格老秀斯自然法观念的基础上并经过对它的个人主义改造,提出在政府产生之前存在一种特定的、与近40年前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几乎截然相反的自然状态:“人依据理性生活在一起,没有公共的最高权威行使裁判之权,此谓自然状态。”^①政府产生于自然状态中所有个人依据理性产生的共同契约,其职能在于保护和协调理性规定的个人天然权利。现代自由主义政治观从此有了它的最根本纲要。一个世纪后,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观又有了一项重大的演化或繁衍,即基于理性观念的感觉论改造的边沁功利主义学说:快乐是谓善,痛苦是谓恶,合乎道德的行为是使个人快乐总和超过痛苦总和的行为,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是道德和政治的唯一目的。在边沁那里,理性表现在对善恶的判断上,而由于善、恶与快乐、痛苦的联系,理性就由抽象的哲学概念变成了一种平常意识(common sense)。

相对而言,在此谈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历史要有把握得多。虽然其中同样有历史的间断性,但与上述历史图景相比肯定小得多。阿奎那系统地提出了意义重大、影响直至当今

^①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es of Civil Government”, in Michael Curtis, ed., *The Great Political Theories*, New York, 1962, V. 1, pp. 172—174.

的“正义战争理论”，至少其很大部分风格和精神实质是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此后，从16世纪西班牙新经院神学家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①到17世纪的格老秀斯，而后从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者，到20世纪美国总统威尔逊和随后延续不断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差不多一脉相承。这一传统的根本，是将国际体系看作洛克自然状态那样的国际社会，其中虽然没有一个最高权力，但有理性的交往纽带和共同规范，而对外政策的目的应当是加强这种交往和规范，削弱乃至逐渐消除国际关系中违背理性的冲突因素。大致从启蒙思想家开始，我们基本上可以用“自由国际主义”一语来称呼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而其最根本前提是理性个人和跨国交往。

在不少启蒙思想家那里，已经有了当今“贸易和平论”、“互相依赖和平论”和“民主和平论”的相当完整的雏形：各国臣民本质上都是世界公民，而商业是将全人类联结起来的纽带，只要各国君主停止对通商的干预，允许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经济法则就会取代制造国际纷争的权势政治；除了实行自由贸易，还必须建立立宪政体或民主政体，因为民众生性热爱和平，由民众的意志控制政府就能保证国际安宁。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部分地孕育于亚当·斯密，在边沁那里系统地正式形成，然后继之以科布

① 关于维多利亚和苏亚雷斯，见 Russel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136—146; Martin C. Ortega, “Vitoria and the Universalist Con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Ian Clark and Iver B. Neumann, eds., *Classic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London, 1996, chapter 5.

登/布赖特,直至格莱斯顿。^①边沁的国际关系信条也是威尔逊的差不多完全的样板。边沁认为:要实现自由贸易,进而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就必须放弃殖民地,建立各国组成的国际议会来规范并防止国家间的纷争;国际议会依靠理性力量而非武力运行,而公众舆论是理性力量的主要体现和最有力的制裁武器;为了保证各国公众对国际事务有公平合理的判断,各国就必须保障新闻自由并废除秘密外交。^②威尔逊深受启蒙思想和19世纪英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影响。正如我国的美国政治和外交研究新秀之一张立平博士在本书“20世纪威尔逊主义的梦想与幻灭”一文中阐述的那样,威尔逊笃信并大力鼓吹战争起因于专制制度、国际权势政治和国际贸易壁垒,强调要有持久和普遍和平,就必须普遍确立民主制度,实施民族自决和公开外交,用世界组织保证国际政治法治化,用自由贸易原则支配国际经济关系。而且,他像边沁那样,认为在国际关系的这种改造中,理性指导下的世界公众舆论具有决定性作用。作为理理应被认作是“美国式自由帝国主义”(犹如伯里克利的“雅典民主帝国主义”)的经典形态,威尔逊主义的巨大影响和巨大后果大抵是三重性的:第一,作为决定性原因之一,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参与塑造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0年危机”,此可谓之“幻灭”;然而第二,威尔逊主义与其后继者赢得了对苏冷战,并且由此造就了美国的空前权势;第三,威尔逊主义与世

① 关于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到19世纪末的英国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参见 Alan Bullock and Maurice Shock, eds., *The Liberal Tradition: From Fox to Keyens*, London, 1956.

② Torbjørn Kuntz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chester and London, 1992, pp. 134—136; F. H. Hinsley, *Power and Pursuit of Peace*, Cambridge, 1967, pp. 81—87.

界政治中的其他若干新力量合成作用,近乎变更性地影响了国际关系思想、国际法和国际伦理,并且有力地助成了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的勃然兴起。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大致从边沁开始,特别是由威尔逊作为最大代表,有了“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哲学”——我国关于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精深研究者苏长和博士界定的“国际关系中的管制自由主义”(见其被收入本文集中的论文),它与古典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哲学“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相对。这是一项很有道理的理论思想分类,对于把握现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想有重要助益,尽管古典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当中分明也可见显赫的“管制自由主义”:格老秀斯的国际法;不被当作“新自由主义”的边沁国际关系信条;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而非欧洲大陆保守主义者)的“欧洲协调”思想。^①以“国际关系中的管制自由主义”和其他某些恰当的、可见于刘鸣博士“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解读”一文的理论性浓缩为概念工具,具备重要性不亚于文本研读的背景理解和精神理解(特别是王义桅博士论析的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美国根源”),并且本着辩证地对待所有各类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原则,就能愈益准确、精当和不带任何情感好恶地把握和评判当今西方的各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说。

从美国建国到今天,美国对外政策史上的自由国际主义是个已有众多研究但仍需继续从事的大课题。它是美国外交思想的基

① Car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New York, 1970, Part Two, section 3.

本主题之一与其复杂图景中的基本成分之一。关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已有两大类非常著名和流行的界定,伴之以同样非常著名和流行的阐释,即(1)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2)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前一类界定首先由汉斯·摩根索 1948 年在其经典《国家间政治》中提出和定型,此后最有名的阐发和延续当推乔治·凯南 1950 年的《美国外交(1900—1950)》和亨利·基辛格 1994 年的《外交》。它们在美国知识界和在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可谓达到了脍炙人口的知名度。后一类界定以美国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主题,在不同的提倡者那里本着不同的根本依据:基于神定,基于种族或“自然”,基于宗教性或准宗教性“使命”,基于现代世界发展。有关的主要历史形态包括:北美清教徒的“山巅之城”观念;“天定命运”论;^① 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② 马汉的盎格鲁—撒克逊海权论;美国自由民主制的普遍主义使命,包括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世界政治哲学;^③ 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经济政治秩序的“霸权稳定论”;当今关于全球化时代的“新帝国论”等(这最后的“新帝国论”在本文集中得到了张家栋博士的阐释)。然而,美国还有一大外交思想传统——“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与上述其他两大传统一样,贯穿于美国对外政策,尽管除了

① 关于“天定命运论”的最佳阐释是美国史经典名著——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the Nationalist Expansion in American History*, Baltimore, 1935.

② 就此极有名的研究论著为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Philadelphia, 1944.

③ 关于此种自由主义使命观早在美国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初期的表现,参见另两部美国史经典名著: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 A., 1967; Felix Gilbert, *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1961.

著名学者约翰·刘易斯约四年前在《国家利益》季刊上发表的辉煌的论文“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杰克逊传统”外，还远没有得到较充分的历史揭示和哲理讨论。

因此，我们可以辨识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如下三大主题，它们以其众多历史形态和思想表现，合成了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1)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它主导了美国作为国际权势政治中的“传统”大国的对外政策；(2)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它主导了美国少有虚饰地单边追逐美国安全和“国家伟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政策；(3)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中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它主导了美国缔造“美国式”理想世界秩序的新型“普遍主义”对外政策。第一类形态最突出地与华盛顿、约翰·亚当斯和尼克松三任总统以及汉密尔顿、凯南和基辛格的名字连在一起；第二类形态在内战前大陆扩张高峰时期之后以里根和小布什为最大代表；第三类形态的典型则有“杰斐逊世界主义”、威尔逊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理想、杜勒斯型的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以及肯尼迪和克林顿行政当局的对外政策核心理念。

在此，有必要简略地谈论“杰斐逊世界主义”和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本土根源。如上所述，威尔逊的那一套可以追溯到16世纪往后大致一脉相承的欧洲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特别是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国际观和19世纪英国的自由国际主义；然而，在主要精神和基本理念上，它更多地来自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从登上新英格兰海岸的清教移民起，经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多数缔造者，直到威尔逊本人及其代代信徒，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和美国理想卓越超群并适合于全世界的信念经久不衰，简直构

成了一种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在这政治文化传统中,相对于欧洲传统权势政治的美国独特和优越感(“自由的例外主义”^①),连同先在新大陆创造新世界、而后改造欧亚旧世界的使命意识,构成主宰美国主流国际观的根本要素。正是基于这两大要素,杰斐逊在18—19世纪之交形成了一套足够系统的外交理念,用一位研究者提出的术语说,就是“杰斐逊世界主义”,其中囊括了后来威尔逊的几乎所有基本信条。^②

在美国对外政策史上,更为常见的是上述三大主题互相交织、从而错综复杂地规定美国政策和塑造其外在面貌的时期,也就是说以这些主题分别衡量并非典型的时期。例如,无论是集“现实政治”(realpolitik)、种族主义和牛仔精神于一身的西奥多·罗斯福(他在发动美国兴起为世界强国的权势飙升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还是开启冷战时代和遏制战略的杜鲁门,其对外政策分明显现出所有三大主题,就西奥多·罗斯福而言尤其如此。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在“杰克逊主义”或“好斗的美国主义”之中,始终有理想性自由国际主义的强劲冲动。在前者主导的大陆领土扩张时期,美国政界和知识界许多人士主张所谓理想主义的、和平的扩张主义,“对美国民主体制的纯粹和明智有着无限的信心,并且预言它将随其他国家和人民在精神上被美国吸引而扩展到整个世界。”^③当代“好斗的美国主义”总统里根和小布什何等强劲地也受到同样

① Akira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Cambridge, M. A., 1972, p. 5.

② David Armstrong, *Revolution and World Order: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1993, p. 73. 又见 pp. 69—70.

③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pp. 2—3.

的信念驱动,更是人所熟知。与此相关,本文集内由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张家栋博士撰写的论文“新自由主义与美国新帝国思想”作了可贵的论说。

总之,在美国外交思想的复杂图景中,几乎满布不同时期内那些同时以多种“主义”为其基本成分的“混杂型”对外政策观念体系。有关的意识形态剖析及其实践考察无疑相对较难,也因此才更需要予以钻研。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本身的研讨也是如此,亦即关注和理解其“混杂型”代表非常重要。例如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亚当·斯密和埃德蒙·伯克的国际关系思想的研究和评判,无疑难于对威尔逊、边沁和詹姆斯·福克斯的,因为后者很大意义上可谓“水清见底”,“一以贯之”,而前者远非如此;也因此,前者更需要得到精细的探究。同样的道理也存在于范围更广的、一般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研究方面。诸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革命主义)之类的大范畴划分是一种高度抽象概括性质的范式划分,而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中,很少甚或极少存在绝对纯粹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或激进主义(革命主义)思想体系或思想家。范式与实际的差别就在抽象与具体、纯粹与混合之间。

就此而言,本文集内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晓研究员撰写的“理性、共和与国际和平——纪念康德逝世二百周年”一文非常引人注目。这位学识和学德皆为杰出的学者抓住并成功地阐述了一个理论难度和思想意义都绝非小可的论题:一位被例如“英国学派”领袖怀特和布尔当作激进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之头号象征(有如霍布斯之于现实主义、格老秀斯之于自由主义)的伟大思想家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康德的激进主义,

就在于设想根本超越国际无政府与其固有的“战争状态”效应，办法是皆为自由主义性质的国内政治改造和国际体制构建。然而，对于实现这一超越，康德的终极信心或真正希望何在？说到底，那不在于共和制度的普遍化，甚至也不在于抽象的理性，因为康德对现实主义者描绘和确信的悲观图景完全承认，完全理解，从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也是个与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大为不同的悲观主义者。必须从他的《世界史》(*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来看问题：他的终极信心或真正希望在于世界史的逐渐演进，尽管是很大程度上不可知的演进。“自然设计与人的道德义务命令的趋同——那从它们之间的冲突当中兴起的趋同，是在他的《世界史》中得到阐说的那种新颖的历史概念的本质，据此历史是朝着一个目的的分阶段发展的逐步演进。”^①在这个意义上，康德不那么是一位自由制度主义者，他超出了本质上没有历史哲学的自由主义。

约翰·克里在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败北，象征自由国际主义尚未能压倒“好斗的美国主义”而重新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尽管当今美国民主党的自由国际主义有其特殊性或个性，不同于先前其他时期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然而另一方面，克里得到的票数那么接近大选胜利所需，从而象征自由国际主义在当今美国拥有很广泛的舆论市场和相应的影响力。因此，在“自由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这个主题之下，最具有当前意义的考察对象之一无疑是大致信奉自由主义的当今美国民主党的对外政策信念。就此，《大西

① F. H. 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Cambridge, 1967, Chapter 4. 引语见 p. 73.